

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

主编 洛秦

上海城市音乐文化研究丛书

上海基督教会学校女子音乐教育研究

陈晶著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CONSERVATORY OF MUSIC PRESS

书馆

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

主编 洛秦

上海城市音乐文化研究丛书

76
11

上海基督教会学校 女子音乐教育研究

陈晶著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CONSERVATORY OF MUS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基督教会学校女子音乐教育研究/陈晶著. —

上海: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2015. 11

ISBN 978 - 7 - 5566 - 0052 - 6

I. ①上… II. ①陈… III. ①基督教-教会学校-
女性-音乐教育-研究-上海市 IV. ①G649.29②J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58730 号

书 名 上海基督教会学校女子音乐教育研究
著 者 陈 晶

责任编辑 杨成秀

封面设计 孙洁涵

出版发行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汾阳路 20 号

印 刷 上海师范大学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265 千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566 - 0052 - 6/J. 1057

定 价 55.00 元

出 品 人 洛 秦

本社图书可通过中国音乐学网站 <http://musicology.cn> 购买

目 录

绪 论 / 1

- 一、选题概述 / 1
- 二、文献综述 / 3
- 三、研究意义 / 7
- 四、研究方法 / 8

第一章 中西女塾与“世俗女性人才”音乐教育 / 9

第一节 校史回溯 / 10

- 一、中西女塾时期(1892—1928) / 10
- 二、中西女中时期(1929—1952) / 14

第二节 音乐科 / 15

- 一、唱歌科 / 17
- 二、琴科 / 18

第三节 音乐活动 / 24

- 一、音乐会 / 24
- 二、音乐交流活动 / 33

第四节 音乐社团 / 34

- 一、声乐社团 / 35
- 二、器乐社团 / 41

II 上海基督教会学校女子音乐教育研究

第五节 小结 / 44

第二章 圣玛利亚女校与“女基督徒”音乐教育 / 46

第一节 校史回溯 / 46

一、圣玛利亚女校时期(1881—1926) / 47

二、圣玛利亚女子中学时期(1927—1952) / 49

第二节 音乐科 / 50

一、琴科 / 50

二、唱歌科 / 61

第三节 音乐社团 / 63

一、琴会与中国音乐会 / 63

二、歌咏团与唱诗班 / 68

第四节 小结 / 71

第三章 男女同校制度下的沪江大学女子音乐教育 / 73

第一节 校史回溯 / 73

一、柏高德、魏馥兰时期(1909—1927) / 74

二、刘湛恩、朱博泉时期(1928—1945) / 75

三、凌宪扬以后的时期(1946—1952) / 75

第二节 开女禁后的音乐教育 / 75

一、课程设置 / 75

二、师资情况 / 82

三、学生情况 / 86

第三节 音乐社团 / 88

一、单一性别音乐社团 / 91

二、男女生共建音乐社团 / 104

三、音乐社团培养的音乐家 / 124

第四节 小结 / 129

结 论 / 130

一、基督教会学校女子音乐教育的历史意义 / 130

二、由基督教会学校女子音乐教育模式引发的思考 / 134

参考文献 / 137

一、中文参考文献 / 137

二、外文参考文献 / 142

附 录 / 143

后 记 / 209

绪 论

一、选题概述

在国内,关于基督教这一名词,一直有广义与狭义概念之区别。从广义上来讲,基督教是天主教、东正教与基督新教的统称。从狭义上来说,基督教又是新教的专属名词。本书所言基督教为基督新教,即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以后,脱离天主教而形成的各个新宗派之统称。基督新教自清代开始传入中国,在众多向中国派遣传教士的国家中,美国无疑是规模最大的一个。19世纪80年代下半叶,美国掀起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学生志愿海外传教浪潮。在这场浪潮中,中国成为最重要的宣教对象,来华传教士为建立有利于福音传播的人文环境,开始在中国大规模地兴办学校。

而美国基督教会在中国开办较早的、较正规的学校恰恰是女校。之所以重视女校的建构,皆因基督教会将女子教育、基督教福音和近代文明三者等而视之。他们一方面利用女子教育来达到传教的目的,另一方面也深信缺乏女子教育是妨碍中国文明开化的一大原因。^①因此,19世纪80年代以后,基督教女子学校特别是女子中学的数目剧增,而女学生之数量也大幅增加。据《基督教势力范围中之教会学校及学生统计表》显示,至1921年,江苏省(旧时包括上海)中学女学生为618名,浙江省为182名;广东省中学女学生为236名,福建省为219名。山东省中学女学生为44名,山西省为58名。^②很明显,江苏省的基督教中学女生人数遥遥领先于其他区域。而这种区域上发展优势的形成又究竟缘于哪些方面呢?

一方面,鸦片战争以后,根据《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规定,开埠后的江

^① 朱峰:《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金陵女大与华南女大比较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6页。

^② 《基督教势力范围中之教会学校及学生统计表》(1921年),载陈国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384—385页。

南地区,特别是上海,一跃成为中国近代发展最为迅疾的区域。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之下浩浩荡荡而来,极大地冲击了国人传统的思想观、价值观。社会上层阶级迫切希望培养自己的子女成为能讲英语、懂得外国礼节的年轻一代。而传教士创办的基督教女校恰好迎合了这种需求。也就是说,上海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城市文化背景为基督教女校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社会基础与人文基础。而当我们再进行深入的考察后就会发现,这种基督教女校区域上的发展优势除因上海开埠后的历史契机外,更与该区域的历史传统与文化氛围同音共律。

自明清以来,江南地区的女子教育便比较发达。正如西方学者苏珊·曼所讲:“在清代,江南是女子教育的中心。”清代女性文学发展十分繁荣,有3000多女诗人出版过专集,女词人和女弹词作家为数甚众,江南女性就是这其中的主力军。^①胡适在《三百年中的女作家》中曾对单士厘编纂的《清闺秀艺文略》进行了区域分类研究,认为若依据籍贯进行分省统计,女作家中江苏、浙江最多,占三分之一,其次是安徽、福建。^②见微知著,正是对女子教育的重视而极大地提高了上海女子的学识,更为基督教女校的涉洋东来铺陈了足够的发展空间。

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基督教会在上海共开办了女子中学10余所,其课程设置除宗教以外,大都十分注重西方音乐知识的传授。这些女校的音乐教育对传播西方音乐文化知识、培养新型女性音乐人才、推动中国近代西方音乐教育现代化进程的步伐、促进中西音乐文化交流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很显然,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然而,关注基督教女校中的音乐教育仅是本书研究中采用的其中一个视角,笔者希冀将观察视域再调整至男女同校的微观校园场景中,考察男女合校的基督教大学中,女生在不同的教育文化环境中的音乐文化生活,以期建构更为完整而多元的女子音乐教育历史。

笔者选择了两所不同办学模式的基督教女子中学,即以培养中西兼通的“世俗女性人才”为主旨的中西女塾和以“培养合格的女基督徒”为主旨的圣玛利亚女校,进而对两所女校的音乐教育进行研究、剖析。

由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创办的中西女塾,经过长期的办学实践,逐步形成了一套自成体系的音乐教学管理模式。校内西方音乐课程虽属选修课范畴,但已日见规模,创设了音乐科,下设提琴科、唱歌科与琴科。特别是琴科,已初具专业音乐学院系制的建构框架,呈现了近似于专业式的音乐教学模式。由此,作为林乐知

^① 徐宁:《近代上海的女学生(1850—1922)》,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1页。

^② 张素玲:《文化、性别与教育:1900—1930年代的中国女大学生》,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55页。

“振兴华人,启迪女学”的教学实践场所,中西女塾音乐科培养了一大批的巾帼音乐家,如史凤珠、王瑞娴、李虞贞、邱贞蕙、周淑安、蒋英、姚锦新、顾圣婴等,堪称基督教女子音乐教育的先锋与典范。

而由美国圣公会创办的圣玛利亚女校,秉承着“培养合格的女基督徒”的主旨而将琴学发展成为重点学科,在当时上海的基督教女校中占领了琴学发展的一席之地。20世纪初,琴科与唱歌科逐次建立,音乐科正式成立。由此,圣玛利亚女校以不同于中西女塾的办学模式,与中西女塾互为呼应,承担着进一步普及和发展上海西方音乐文化的任务。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到来,妇女解放与男女平等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所关注的焦点之一,让女性享有高等教育权利的呼声此起彼伏。沪江大学于1920年接收了4名女生,成为基督教大学男女同校的肇端。

开女禁后的沪江大学使女子获得了与男子同等的受教育权利,增加了女子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为其开拓了更加广阔的学习空间。特别是1929年,音乐系与音乐师范科的成立,促动基督教女子音乐教育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使女子音乐教育模式趋于完善。从而为笔者考察男女合校的基督教大学中女生的音乐文化生活提供了范例。

本书撰述的时间上限为19世纪末,之所以从这里开始是因为笔者的第一个研究对象——中西女塾的琴科创建于1896年。时间下限为20世纪50年代,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同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中美关系急剧恶化。12月,政务院通过了《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表达了中国政府坚决收回教育权的决心。^①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中西女塾与圣玛利亚女校合并成为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沪江大学音乐系并入华东师范大学。至此,这些基督教会学校的女子音乐教育文化也永远地保存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二、文献综述

对于中西女塾、圣玛利亚女校与沪江大学的文献搜集、整理、分析是本书研究的第一步,以期厘清这三所基督教会学校的基本发展脉络与办学规律。从文献种类上来看,笔者将其概括为原始文献以及研究文献两类。在原始文献综述部分,主要阐述原始文献的搜集、保存概况,囿于篇幅所限,笔者并未一一胪列文献名目,详尽名目可参见参考文献中史料部分。研究文献综述部分,笔者将其分为三大类别,一为关于中国基督教会学校音乐教育研究现状,一为关于三所基督教会学校及其音乐教育研究现状,一为性别研究在音乐学中的应用现状。

^① 熊月之、周武主编:《圣约翰大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92页。

(一) 原始文献综述

基督教于嘉庆十二年即 1807 年入华之后,留下了卷帙浩繁的中英文资料。有关基督教教育的资料散落于国内各档案馆与图书馆,尚缺乏系统性的整理,尚未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通过笔者先后在上海、苏州、湖州、北京等地调研,搜集到了关于基督教会学校的大量一手资料以及传记、回忆录、纪念文集等,其保存情况与文献名目见下表所示。

学校名称	原始文献保存地点与名目概述
中西女塾	上海档案馆、上海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其中上海档案馆是国内保存中西女塾原始文献资料最为完整的部门。保存着中西女塾期刊《墨梯》(中英文版,1917—1946)以及行政类、校务类等资料。
圣玛利亚女校	上海档案馆、上海图书馆。其中上海档案馆是国内保存圣玛利亚女校原始文献资料最为完整的部门。保存有期刊《凤藻》(中英文版,1919—1941)、《圣玛利亚女校简章》《圣玛利亚女校章程总目》等。
景海女塾	苏州档案馆、苏州大学档案馆、苏州图书馆、苏州地方志馆。另根据本人从苏州基督教协会牧师处了解,景海女塾本身的演变过程相当复杂,再加上“文革”期间,其早期的完整资料全部被销毁。因此,苏州档案馆是国内保存景海女塾资料相对完整的部门。存有期刊以及各种官式文件等。
湖郡女校	湖州档案馆,存有《湖郡》创刊号(中英文版),1933年8月发行。《湖郡女子中学四十周年纪念刊》,湖郡女子中学民国24年印行等资料。
沪江大学	上海档案馆、上海理工大学档案馆、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其中上海档案馆是国内保存沪江大学文献资料最为完整的部门。保存有《沪江大学年刊》(中英文版,1917—1952)、《沪江大学一览》(1929—1938)、月刊等,还有各种回忆录、纪念影集、文集等资料。

(二) 研究文献综述

除原始文献以外,笔者还参阅、借鉴了学者的大量研究成果,为笔者的研究拓宽了研究思路与研究视域。

1. 关于中国基督教会学校音乐教育研究现状

迄今为止,孙继南的《我国近代早期“乐歌”的重要发现——山东登州〈文会馆志〉“文会馆唱歌选抄”的发现经过》^①、刘再生的《我国近代早期的“学堂”与“乐

^① 孙继南:《我国近代早期“乐歌”的重要发现——山东登州〈文会馆志〉“文会馆唱歌选抄”的发现经过》,载《音乐研究》,2006年第2期。

歌”——登州〈文会馆志〉和“文会馆唱歌选抄”之史料初探^①、宫宏宇的《基督教传教士与中国学校音乐教育之开创》(上、下)^②、金世余的《我国近代教会学校音乐教育管窥》^③等文章以及张媛的《浅论北京教会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④、袁昱的《燕京大学音乐系历史研究》^⑤等学位论文对基督教会学校的音乐教育进行了较系统和深入的梳理、研究。但总的来看,对于基督教会学校音乐教育这一课题的研究基础还比较薄弱,尚属起步阶段。

2. 关于三所基督教会学校及其音乐教育的研究现状

到目前为止,对于中西女塾的研究仅有胡卫清发表在2002年9月《韩山师范学院学报》上的《上海中西女塾简论》,段春敏等发表在2009年第23期《青年文学家》上的《中西女塾的教学管理特色及历史影响》两篇论文对该学校进行了专门性研究,但其研究重点是女子教育,对该校音乐文化着墨不多。在介绍中国基督教会学校的论文中都会对中西女塾的音乐教育有简略的交代,如王求真发表在1998年3月《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的《近现代上海音乐教育的发展》,宫宏宇发表在《音乐研究》2007年第1期上的《基督教传教士与中国学校音乐教育之开创(上)》等文,但并未有详尽全面的阐述。其他的一些回忆录如薛正《我所知道的中西女中》、于芷莘《上海中西女塾杂忆》等,并未形成研究体系。在汪毓和编著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第二次修订版)^⑥、孙继南编著《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纪年(1840—2000)》(增订本)^⑦、陈建华与陈洁编著《民国音乐史年谱》(1912—1949)^⑧等专著里也概要性地提到了中西女塾的音乐教育与活动。迄今为止,对中西女塾音乐文化进行专门性的研究工作,学界尚无人涉足。而对于上海另一所基督教女校——圣玛利亚女校的音乐教育状况基本无人做专题研究。

对于基督教大学的研究,国内学者对这一专题史的研究始自20世纪80年代,而聚焦在沪江大学的著述包括王立诚《美国高等教育在中国:沪江大学个案研究》^⑨、王立诚《美国文化渗透与中国近代教育:沪江大学的历史》^⑩。还包括大量

① 刘再生:《我国近代早期的“学堂”与“乐歌”——登州〈文会馆志〉和“文会馆唱歌选抄”之史料初探》,载《音乐研究》,2006年第3期。

② 宫宏宇:《基督教传教士与中国学校音乐教育之开创》(上、下),载《音乐研究》,2007年第1、2期。

③ 金世余:《我国近代教会学校音乐教育管窥》,载《交响》,2008年第1期。

④ 张媛:《浅论北京教会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⑤ 袁昱:《燕京大学音乐系历史研究》,中央音乐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⑥ 汪毓和编著:《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第二次修订版),人民音乐出版社、华乐出版社,2005年。

⑦ 孙继南编著:《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纪年(1840—2000)》(增订本),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

⑧ 陈建华、陈洁编著:《民国音乐史年谱》(1912—1949),上海音乐出版社,2005年。

⑨ 王立诚:《美国高等教育在中国:沪江大学个案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5年。

⑩ 王立诚:《美国文化渗透与中国近代教育:沪江大学的历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的校史文献、回忆录的撰述,如[美]海波士《沪江大学》^①、朱博泉《沪江大学校史述略》^②、许晓鸣主编《隽永——沪江大学历史建筑》^③、沪江大学校友会编《沪江大学纪念集(1906—1986)》^④、沪江大学校友会编《沪江大学九十周年纪念集》^⑤等。但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沪江大学的校史撰写、教育体制研究等方面,而对于其音乐文化研究却基本无专史阐述。

综上所述,虽然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国内外学界的共同推动下,基督教会学校的研究已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与重视,但目光大都集中在基督教大学教育上,对于中学教育倾注的目光较少。并且,学者们所关注的大多是对基督教大学的综合性研究,较少关注其音乐教育与音乐活动。

3. 性别研究在音乐学中的应用现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国外音乐学界的启发之下,国内音乐学界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性别研究的角度出发,倾听其在音乐学领域中所发出的声音。如珍妮·鲍尔斯著、金平译《女性主义的学术成就及其在音乐学中的情况》(上、下)^⑥、汤亚汀的《社会性别与音乐》^⑦、王丽莉的《性别研究在音乐学中的现状及研究方法》^⑧。这些文章为音乐学方法论增添了一个新的维度——性别研究,并为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框架支撑。

姚亚平的《西方音乐历史编撰学的传统与创新》^⑨、方建军的《婚礼歌曲研究的新视野——简·舒格曼〈性别化的歌曲普莱斯帕地区阿尔巴尼亚人婚礼中的歌唱与主体性〉评介》^⑩、解晓静的《试析新时期大众音乐中女性意识的形成与社会环境》^⑪、詹桥玲的《中国新歌剧中的女性意识》^⑫等文章进入到了个案剖析阶段,探寻性别研究在音乐学中的具体应用和其在音乐学研究中的功能与价值。相较而言,

① [美]海波士:《沪江大学》,王立诚译,珠海出版社,2005年。

② 朱博泉:《沪江大学校史述略》,载《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7辑》,1984年。

③ 许晓鸣主编:《隽永——沪江大学历史建筑》,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

④ 沪江大学校友会编:《沪江大学纪念集(1906—1986)》,1986年。

⑤ 沪江大学校友会编:《沪江大学九十周年纪念集》,1996年。

⑥ 珍妮·鲍尔斯:《女性主义的学术成就及其在音乐学中的情况》(上、下),金平译,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7年第2、3期。

⑦ 汤亚汀:《社会性别与音乐》,载《交响》,2003年第2期。

⑧ 王丽莉:《性别研究在音乐学中的现状及研究方法》,载《艺术教育》,2007年第2期。

⑨ 姚亚平:《西方音乐历史编撰学的传统与创新》,载《天籁》,2007年第3期。

⑩ 方建军:《婚礼歌曲研究的新视野——简·舒格曼〈性别化的歌曲普莱斯帕地区阿尔巴尼亚人婚礼中的歌唱与主体性〉评介》,载《交响》,2002年第4期。

⑪ 解晓静:《试析新时期大众音乐中女性意识的形成与社会环境》,载《中国音乐学》,2007年第1期。

⑫ 詹桥玲:《中国新歌剧中的女性意识》,载《中国音乐学》,2003年第4期。

民族音乐学学者对于性别研究所做出的尝试较多,如周凯模的《民间仪式中的女性角色、音乐行为及其象征意义——以中国白族“祭本主”仪式音乐为例》^①、程琴的《试析“花儿”中女性演唱内容的性别体现》^②、荣英涛的《社会性别视角下有关音乐与行为的主动选择分析——河北井陘县东头村农历七月十九观音老母庙会个案研究》^③、张益琴的《女性在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中的角色定位与价值——以甘肃文县白马藏族为例》^④等。

在这些研究成果基础之上,性别研究在音乐学中又向深度上做了细究,广度上做了拓展,产生了一批硕士学位论文,如马骅《论普契尼歌剧中的女性人物的性格刻画》^⑤、马晔《性别视角下的我国高等师范音乐教育现状之研究——以山东省为例》^⑥、段蕾《晚清女性的音乐新生活:以1898—1911年的39种报刊为主》^⑦。

综而观之,20世纪末,性别研究在音乐学中的应用已逐渐“浮出地平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并试图在这个较新的研究空间中做出进一步的探寻。

三、研究意义

其一,20世纪80年代以前,学术界一直在“文化侵略”范式的主宰下研究基督教教育,致使其难以获得公正和客观的评价。然而,基督教会学校在中国的发展逾年历岁,前后将届百年,并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因此,将中西女塾、圣玛利亚女校与沪江大学这三所学校的办学历史进行解读、剖析,可以为中国基督教会学校包括中学与大学的整体观照与宏观研究,提供坚实的个案研究基础。

其二,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会学校音乐教育逐步开展,成为中国近代新式学校音乐教育的滥觞。20世纪初,中国新制音乐教育肇始,基督教会学校音乐教育与中国学校音乐教育形成了互为平行而又互为补充的发展模式。缘于

① 周凯模:《民间仪式中的女性角色、音乐行为及其象征意义——以中国白族“祭本主”仪式音乐为例》,载《音乐艺术》,2005年第1期。

② 程琴:《试析“花儿”中女性演唱内容的性别体现》,载《音乐天地》,2005年5月。

③ 荣英涛:《社会性别视角下有关音乐与行为的主动选择分析——河北井陘县东头村农历七月十九观音老母庙会个案研究》,载《人民音乐》,2009年第3期。

④ 张益琴:《女性在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中的角色定位与价值——以甘肃文县白马藏族为例》,载《艺术探索》,2010年第3期。

⑤ 马骅:《论普契尼歌剧中的女性人物的性格刻画》,上海音乐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⑥ 马晔:《性别视角下的我国高等师范音乐教育现状之研究——以山东省为例》,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⑦ 段蕾:《晚清女性的音乐新生活:以1898—1911年的39种报刊为主》,中央音乐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此,探究基督教会学校音乐教育在中西音乐文化交流史、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史、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以及对现实办学有何借鉴意义,这些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笔者拟从三所基督教会学校音乐教育历史切入,冀能对上述问题做出较为科学、客观的评价。

其三,本书以女子音乐教育历史为论题,将性别研究方法引入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研究领域,为音乐史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一个评析和阐释问题的不同视角。基督教会学校女子音乐教育对晚清以来存有性别歧视的教育体制提出了挑战,为中国女子提供了接受正规学校音乐教育的机会,在女子音乐教育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但是长期以来,这段历史一直处于被隐没与忽视的境况,而本书的撰述将会填补基督教会学校女子音乐教育的空白点。

四、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选用地得当与否,将对本书的写作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笔者在撰写过程中采用了如下一些研究方法。

(一)对中西女塾、圣玛利亚女校、沪江大学的女子音乐教育与音乐活动的各类文献进行梳理与分析,是本书写作的最基础性工作,并希冀透过史料的表象去领悟文字符号所携带的文化内涵。

(二)将这三所基督教会学校与同时期内的国立学校或基督教会学校从教育教学、管理方式、音乐文化等方面进行横向比较研究,以凸显基督教会学校女子音乐教育的特征。

(三)多学科研究方法。基督教会学校女子音乐教育是一个交叉论题,本书在音乐史学研究方法基础之上,结合社会性别学、宗教学、教育学、历史学等方法进行综合性研究。

第一章 中西女塾与“世俗女性人才”音乐教育

1892年,美国基督教监理会^①传教士林乐知^②(Y. L. Allen, 1836—1907)于上海创办中西女塾。林乐知认为“女学者,使之读西书,明外事,擅文才,而后其志气高尚,其识见远大,其位置崇亢,而不肯自卑”^③。校长海淑德称中西女塾“专教中华女子中西书史与一切有关实用之学”^④。很明显,中西女塾办学之动机不单纯是培养高水平的教职人员,而是将其定位在塑造中西兼通的“世俗女性人才”上。在此办学理念的指导下,中西女塾培养了一大批巾帼英杰,宋庆龄和她的姐妹宋蔼龄、宋美龄,著名表演艺术家周采芹,著名导演黄蜀芹等都曾就读于此。同时,由于对西方音乐教育的重视,中西女塾为中国近现代音乐界贡献了史凤珠、王瑞娴、李虞贞、邱贞蔼、周淑安、蒋英、姚锦新、顾圣婴等众多女音乐家。但由于各方面原因的影响,致使对其音乐教育的研究长期缺失在中国音乐教育发展史的研究领域中。

① 监理会,由英国牧师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 1703—1791)创立,在美国被称为卫斯理宗。1844年分南北两支,北方派称美以美会,南方派称监理会。监理会自1848年开始向中国派传教士,传教范围集中在江南和浙北一带。引自姚民权、罗伟虹:《中国基督教简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37—38页。

② 林乐知,美国佐治亚州人,1860年携眷来到上海。不久,美国南北战争爆发,林乐知被迫放弃布道工作,改任上海广方言馆讲师,同时翻译书籍,创办《万国公报》(The Globe Magazine),在中国社会产生很大影响力。引自薛正:《我所知道的中西女中》,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解放前上海的学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93—294页。

③ 胡卫清:《上海中西女塾简论》,载《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9月,第17页。

④ 海淑德、连吉生:《中西女塾章程》,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印行,第1页。

虽然,中西女塾之肇始是以“开办学校为布道之先驱,以教育介绍教会”^①为目的,但是客观上却推动了中国近代文化教育,特别是西洋音乐教育现代化进程的步伐,培养了中国近代第一批掌握西方现代音乐知识的女性。

第一节 校史回溯

自 1892 至 1952 年,可谓日久岁深,涵盖了女校经历的两大阶段:中西女塾时期(1892—1928)与中西女中^②时期(1929—1952)。中西女塾自 1892 年创设,始终践行着“以学辅教”的理念,即通过启迪民智进而改造中国文化和社,并最终引导中国人皈依上帝。1930 年,中西女塾正式向中国政府立案,并改校名为“中西女子中学校”。学校从教学理念到课程设置皆有大幅调整,从此开启了华人治校的新篇章。1952 年 7 月,上海市教育局将女校和圣玛利亚女校合并为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中西女塾结束了 60 年的办学历程。

一、中西女塾时期(1892—1928)

林乐知在《全球五大洲女俗通考》一书序中写道:“本书之宗旨,可用两言以蔽之:一曰观教化者以女人为定格,一曰凡国不先将女人释放提拔,而教养之使其成材,决不能有振兴之盼望。”^③林乐知素来的“振兴华人,启迪女学”的志愿在中西女塾的办学过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与体呈。

中西女塾尚在酝酿绸缪之时,关于校长的人选成了林乐知的一大难题。他需要的是具备“良好的家庭、高等的教育”“富才华、有经验”的“女领袖”来出任校长一职。林乐知将目光聚焦到了海淑德^④(Lanra Haygood, 1845—1900)的身上。经过林乐知苦心孤诣、不胜其烦的 6 年劝说后,1884 年,海淑德终于从美国启程来到上海,担任中西女塾的第一任校长,并定校训“爱、生活、成长”。

成立之初,学生人数寥寥。但在海淑德办学宗旨的一以贯之之下,中西女塾的声誉日隆。1900 年至 1910 年,每年毕业生均为两至三人;从 1914 年至 1920 年间,人数最多的 1914 年,毕业生为 12 人;从 1921 年开始,情况大为改观,每年毕业生

① 董宝良主编:《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76 页。

② 为统一起见,本章统称女校为“中西女塾”。

③ 张素玲:《文化、性别与教育:1900—1930 年代的中国女大学生》,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 年,第 4 页。

④ 海淑德,监理会女传教士,美国佐治亚州人。父亲是律师,母亲是教师。自幼信奉上帝,精通多国语言。大学毕业后开始担任教师。引自薛正:《我所知道的中西女中》,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 59 辑——〈解放前上海的学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295 页。

均在 20 人以上。^①

1892 年 3 月 15 日,《北华捷报》上刊登了海淑德校长的办学宗旨,阐明了中西女塾的教学对象、教学内容、教学理念和教学主旨。

(一) 教学对象

从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开始的基督教向东方的大规模布道活动除宗教原因之外,更多的是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及与之相伴的欧美国家征服世界的欲望。传教运动是西方谋求对东方进行精神与文化控制的表现之一。^② 当传教活动与西方政治、经济活动存在着明显的合作关系时,中国人对这些黄毛蓝眼的布道人必然存有强烈的戒备、抵触心理。再加之当时社会上盛传的“洋人挖眼制药”的流言,中国人皆将传教士所办学校视为畏途。早期基督教会学校只能以提供免费食宿等方式来“招揽赤贫”,使其皈依基督。这种情况一直持续至 19 世纪 60 年代,基督教会学校一直处在跋扈寇尾的境况。然则,1890 年,在上海举办了在华传教士第二次大会,会上讨论了基督教会学校招生问题,大多数传教士赞同必须把招生对象转向富家子弟,主张教育收费。^③ 林乐知对此的解释是:“为什么我们教会在中国要不断地为乞丐开办义务学校呢?倘若让富有的和聪明的中国人先得到上帝之道,再由他们去广泛地宣传福音,我们岂不是可以少花人力物力,而在中国人当中无止境地发挥力量和影响吗?”^④

据此,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制定的《中西女塾章程》中规定:“本塾专教女生,无论年龄大小,只愿守塾规皆可来学”,并且“住馆学生每月备膳洋四元正”。^⑤ 章程中还特别对琴课的收费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一学生如欲学琴须于修膳外每月另加琴,备洋一元正,因修琴费昂故也。”^⑥

“自壬辰春间试办以来,迄今已阅五载,从学者日多,精进者亦复不少。”^⑦ 因此,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的《中西女塾章程》进行酌改,将入学要求和收费标准再度提高:“本塾专教女生……惟八岁以下不收”,“住馆学生,每月修洋五元,

① 《中西女子中学会通讯录》(其中 1911 至 1913 年、1915 年缺失),中西女子中学编印,无页码,存于上海档案馆。

②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近代基督新教传教士在华社会、文化与教育活动研究》(修订本),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34 页。

③ 胡小君:《近代中国基督教中学研究》,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 年,第 7 页。

④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228 页。

⑤ 海淑德、连吉生:《中西女塾章程》,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印行,第 2 页。

⑥ 同上,第 3 页。

⑦ 连吉生:《上海中西女塾章程》,载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 年,第 228 页。